一九五三年税制改革前后的商业与财政

林 超 超

〔摘要〕1953 年新税制因在宣传中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原则，引起极大争议。通过梳理新税制出台前后的商业与财政状况，可以看到 1952 年底国营商业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与 1953 年初税制改革的启动，都是中央政府从商业流通领域增加财政收入的尝试：前者可减少商品流通成本，加速资金回笼；后者为确保每个流通环节的税征到位。新税制出台后，在市场供应中出现的“公退私进”，不是取消国营商业税收优待的结果，而是源于同期国营商业企业推行经济核算制后压缩库存，减少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私商得以掌握更多货源。

〔关键词〕1953 年新税制；工商税收；私商；国营商业企业；经济核算制

〔中图分类号〕D232；K2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24)-06-0127-09

Commerce and Finance Before and After the 1953 Tax Reforms

Lin Chaochao

Abstract: The new tax system implemented in 1953 provoked significant controversy due to its principle of “equal taxation for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as was presented in the propaganda. By examining the commercial and fiscal conditions before and after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tax system, it becomes clear that both the introduction of economic accounting in state-owned commercial enterprises at the end of 1952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tax reforms in early 1953 were attempts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increase fiscal revenue through the commercial circulation sector. The former aimed to reduce commodity circulation costs and to accelerate capital turnover, while the latter sought to ensure tax collection at every stage of the circulation process. Following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new tax system, the phenomenon of “public retreat, private advance” market supply was not the result of the canceling of tax benefits for state-owned commercial enterprises. Instead, it stemmed from state-owned commercial enterprises reducing their inventories and cutting back on processing orders from private industries after implementing the economic responsibility system. This allowed private merchants to gain greater control over the supply of goods.

1953 年初的税制改革备受历史学界关注，一般认为，这次税制改革一方面是为了简化“多税种、多次征”的现行税制，另一方面是针对工商税收收入在国家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逐年下降而调整公私税负。由于私营工商业接受国营商业机构加工订货、代购包销的范围日益扩大，以及深购远销、产销见面等私商经营方式的拓展，商品周转的次数大为减少。在这个过程中，税务机关对每件商品征收的营业税也相应减少。为此，新税制意图改变营业税的纳税环节，在工厂出售产品时即完成工业和商业批发环节的两道营业税的缴纳。^①

但新税制在宣传中提出的“公私一律平等纳税”原则，违背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税收政策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采取限制政策的决议^②，故而成为 1953 年夏季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会议的批判焦点。也正是在这次会议期间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正式

① 匡家在：《1953 年修正税制对经济的影响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 年第 1 期；武力：《一九五三年的“修正税制”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05 年第 5 期。

②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431 页。

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因此，有学者认为新税制在把握公私关系上的争议，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形成^①。需要指出的是，即便“公私一律平等纳税”，对于国营商业机构和私商而言，意义也是不一样的。国营商业机构主要以利润形式上缴收入，增加税负后，其上缴利润可能降低。新税制出台后出现的对国营商业不利的局面，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在税制上取消了对国营商业机构的优待。为揭示其中被忽视的历史面相，本文将重新梳理 1953 年税制改革前后的商业与财政状况。

一、国营商业扩张与中央税收下降

1950 年统一财经后，除中央批准的地方税外，所有关税、盐税、货物税、工商税的一切收入，均归中央财政部统一调度使用。与此同时，中央贸易部（后改组为商业部和对外贸易部）先后成立了粮食、盐业、油脂、花纱布、百货、土产、石油、工业器材等国营商业专业总公司，并在全国各地设置相应的分支机构，统一经营国内贸易。从 1950 年至 1952 年，全国各地国营商业机构从 8000 个增至 3.1 万个。^②虽然在数量上与私商还有很大差距，但这些国营商业机构经营着粮棉、百货等与民生关系重大的商品，且主要从事批发业务。三年间，国营商业营业额（含批发、零售）从 36.2 亿元增至 153.1 亿元，占公私商业营业总额的比重从 16.6% 增至 44.4%^③。

尤其是“五反”运动以后，全国私营商业衰退显著。1952 年 1 月至 5 月，华东区济南、南京、无锡、上海、杭州五个城市的私营商业营业额较上年同期平均下降 28% 以上，个别地区下降幅度超过 40%。如果考虑物价上涨的因素，这个数字还会更大。1952 年 3 月以后，国营商业加大了对私营工商业的加工订货、经销代销，促进各地物资交流，人民银行亦扩大贷款投放，但私营商业的恢复不如工业。直至 6 月，只有上海等少数城市的私营商业流转额恢复到接近 1 月时的水平，大部分城市特别是内地城市私营商业仍很不景气。这种情况下，国营商业进一步扩张。在国营商业掌握了进口货源和扩大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以后，私商在批发业中的比重下降很快。一些经营的商品较早被国营商业替代的行业的私商，或酝酿转业，或改营零星的小工业品，转向中小城市的私营工厂进货，销售对象也由外埠批发商转向当地和邻县的零售店乃至摊贩。1952 年底，北京市私营批发业在批发业总营业额中所占比重从上年同期的 60% 降为 31%；上海私营商业中 55 个主要行业的自有资金下降至 1950 年同期的 66.04%，其中批发行业下跌近 50%。在零售方面，中财委关于国营及合作社商业不超过 25% 经营比重的规定，在不少地方也被突破了。^④

1952 年以来，国营商店既排挤了私商的零售业务，批零差价过小也使得私营零售商无利可图。百货公司商品的批零差价一般都在 8% 至 12% 之间，部分商品甚至低于 8%^⑤。私商盈利空间狭小，直接导致纳税能力下降。1952 年前九个月，国内各项税收收入只完成计划（按 8 月调整后的预算）的 69%^⑥。1952 年 11 月，为改变私商衰退导致税收下降的局面，中共中央继 1950 年后再度发出《关于调整工商业的指示》，要求国营商业退出一些阵地，减少零售店，容许私人资本经营零售业务

① 任晓伟：《论 1953 年修正税制问题的由来及其历史实质》，《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 年第 1 期；吴磊：《1953 年税制改革及其对新中国公私关系发展趋势的影响》，《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6 年第 2 期。

② 另，供销合作社从 4.4 万个增至 11.3 万个。参见《1953—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商业卷》，中国物价出版社，2000 年，第 607 页。

③ 《1953—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商业卷》，第 609 页。按：为统一行文，本文出现的价格均为 1955 年 3 月 1 日发行的人民币新币价格。

④ 《1949—195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商业卷》，中国物资出版社，1995 年，第 371—372、375—377、389、415—416 页。

⑤ 《1949—195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商业卷》，第 389 页。

⑥ 《1953—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财政卷》，中国物价出版社，2000 年，第 221 页。

和贩运业务。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就是扩大批零差价，将日用百货批零差价扩大为10%至18%。^①上海市将日用百货类商品的批零差价从9%至15%调整为11%至18%，药材类从3%至25%调整为7%至30%；天津市将15种生活必需品的批零差价由13.07%扩大为16.37%，35种日用百货由9.22%扩大为13.14%^②。扩大批零差价可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调低商品批发价，一种是提高零售价。为避免国营商业营收下降，影响到利润与税收上缴，一般都采取的是后一种办法，即提高零售价，物价因此略有上涨。

调整批零差价以后，私商营业额在短期内即有大幅增长。根据上海市191家私营商户的调查，1952年12月上旬与11月下旬相比，米业营业额增长21.2%，酱酒业增长10.66%，棉布业增长12.45%，百货业增长100.78%。北京市87家私营商户在一个月内，粮食业营业额增长11.6%，百货业增长25.36%，绸布业增长36.78%，纸张文具业增长118.39%，土产食品业增长45.9%。在一些中小城市，如中南区的南昌、长沙、九江、江门、南宁及沙市等六个二类市场，12月与11月比较，私商营业额增长幅度也达到12%至43%；南阳、新化、天门、上高、沙坪、钦州等六个三类市场，增长幅度最小为3.7%，最大为84%；内乡、广水、防城等三个四类市场，增长幅度最小为2.32%，最大为69.96%。^③

调整工商业政策为私营商业带来了营业收入的增长，但至1952年12月中旬，全国的营业税收入只完成该年计划的77%^④。根据税务总局《1952年全国税务工作报告》，1952年全国范围内的税收收入勉强完成了调整后的计划，占全国税收收入约70%的华东、中南、西南三区未完成计划。从税种上看，私营营业税少收较多，只完成计划的82.4%。^⑤ 营业税收入下降还与商业活动中公私经营比重的变化有关。自国营商业扩张以来，其总分机构调拨商品因不视为营业行为，不课征营业税，致使税务局每年从商业活动中征得所得税的营业额部分缩小。加之国营商业及合作社商业大量采取加工订货、代购包销的方式经营，税务局仅从工缴费（加工费）和手续费上征得一些营业税，与按产品总值课税比较，税负上相差较多。大部分产品的工缴费只占销售额的二三成，甚至更少。^⑥

与此同时，私营零售商为了降低成本、同国营商业竞争，组织联购联销。1952年下半年，在“五反”运动中解散的商业联营组织重新恢复经营。据1952年11月底的调查，上海市参加商业联营的私商有8066户，以土特产业为多。这些私商资金薄弱，组织起来后可以集中人力、财力，开辟新的贸易路线。如上海蔬菜业组织联营后，向外地采购蔬菜，进价是上海市郊价格的一半。^⑦ 再以米业为例，过去外埠来米经由本埠米行、米店，再出售给消费者，其间需流转三次，现由本埠米店直接下乡采购，流转层次减为一次。生产工业品的私营厂商也愿意直接售货给零售商或委托零售商代售。^⑧ 私营工商业走向深购远销、产销见面，必然带来营业税收入的减少。

二、国营商业压缩库存与“公退私进”

国营商业的扩张直接或间接地造成营业税收入的下降，而其自身的经营又无法做到企业化的成本核算，实现盈利。专业公司只是在收购季节牌价高于市价时，大量收购商品；在市价高于牌价时，

① 《1949—195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商业卷》，第 397—398 页。

② 《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商局关于调整批零差价的报告》（1952 年 12 月 12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111-2-289；《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资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 年，第 75 页。

③ 《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资料）》，第 76 页。

④ 《1953—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财政卷》，第 390 页。

⑤ 匡家在：《1953 年修正税制对经济的影响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 年第 1 期。

⑥ 《上海市税务局 1952 年度税收分析报告》（1953 年 3 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97-1-363。

⑦ 倩华等编著：《七年来我国私营工商业的变化（1949—1956 年）》，财政经济出版社，1957 年，第 61—63 页。

⑧ 《上海市税务局 1952 年度税收分析报告》（1953 年 3 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B97-1-363。

大量抛售商品。^① 各级国营商业公司在与私商的竞争中能够保有优势，只是因为上级专业公司在价格上的优待。事实上，各主要城市先后成立的国营零售公司，大部分存在实质亏损的情况，靠专业公司的价格优惠才不致在账面上亏损，甚至有的零售公司常以流动资金垫付上缴利润^②。亏损的原因除了商品流通中较高的成本消耗，还在于各级国营商业公司现有的财务管理与经营方式。

根据政务院 1950 年颁布的《关于统一全国国营贸易实施办法的决定》，各国营商业专业总公司为经济核算单位，具有固定资金与流动资金，与人民银行建立贸易金库制。各大区及各省分支公司的一切现金收入，包括售货收入及其他收入在内，均须于当日缴入贸易金库；各级公司的一切现金支付，包括采购用款、税款、仓库建设费用、经营费用、人员开支费用在内，须逐级上报至专业总公司，经中央贸易部批准后，通知贸易金库支付^③。也就是说，除专业总公司外，各级商业公司不进行独立经济核算、不计盈亏，财务管理采取资金逐级下拨、货款全部上缴的大回笼制。经过多年的资金投放后，各级商业公司的家底不断增大，却提不出存商品的品名、规格、数量和价值，大量商品长期积压仓库。客观上说，国营商业负担了一些政治性的收购任务，但更多是因为进销货不依据市场需求，“上边有什么拨什么，下边来什么卖什么，上边确定什么价卖什么价”。商品长期积压又造成资金积压，资金周转越来越慢。商品调拨过程中的迂回运输也增加了成本。^④

1952 年以前，国营商业系统有过多次推行经济核算制的动议，出于保证供应和稳定物价的考虑，均未付诸实践。实行经济核算，就是要求企业在必要的资源支持下独立经营，以实现盈利和利润上缴为目标。商业企业的利润是商品的进销差价减去流转费用与税款后的余额。在经济核算的条件下，企业的经营成果就取决于生产产品的劳动力、资金与材料的合理使用程度。遇到流动资金不足时，企业向当地银行办理短期信贷，这就促使其必须关心产品的出售，加速资金回笼，以按期归还贷款。加速资金周转对于积累国家资金有着重要意义，它可以腾出更多资金供建设投资之用。^⑤

1952 年 9 月，全国大区贸易部长会议明确了实行经济核算制的条件已经成熟。根据中财委指示，国营商业企业计划于 1953 年 6 月底前全部实行经济核算制。1952 年 10 月起，商业部先在河北省邯郸地区百货公司系统内进行试点：在机构方面，改变现行按行政区划调拨商品，以买卖关系（合同）所规定的商业网建立各级批发站；在财务方面，核定各级公司和批发、零售企业的资金，在银行开立结算账户，独立核算盈亏。12 月以后，华东全区与中南区部分地区的百货公司系统也开始参照邯郸经验，试行经济核算制。^⑥ “过去家底不清没关系”，“肉烂在锅里，东西还在，现在家底不清就过不去了”^⑦。1952 年底，全国国营商业机构共清点出商品库存总价值 57 亿元，比 1951 年同期增加 24 亿元。商业部部长曾山、副部长姚依林向毛泽东提交了国营商业经营不善、积压商品过多、占用大批资金的汇报。在得到毛泽东的批示后，1953 年 1 月的全国商业厅（局）长会议做出压缩库存、挤出资金（即“泻肚子”）的决定。^⑧

这次会议拟定了具体的核资办法：商品资金以销售淡季所需的最低储存定额为准；商品定额周转资金以 10% 为自有资金，其余由银行贷款解决。会后，各商业专业公司系统开始全面推行经济核算制，相继建立了一、二、三级批发站。专业公司主要担负企业管理任务，批发站为经营机构，担

① 《1949—195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商业卷》，第 749 页。

② 《1953—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商业卷》，第 585、636 页。

③ 《1949—195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金融卷》，中国物资出版社，1996 年，第 440—441 页。

④ 《1953—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商业卷》，第 631—639 页。

⑤ 旦谷编著：《国营商业企业的经济核算制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 年，第 51—53 页；《国营贸易企业决定明年实行经济核算制》，《人民日报》1952 年 12 月 5 日。

⑥ 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新中国商业史稿（1949—1982）》，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4 年，第 28 页。

⑦ 《1953—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商业卷》，第 647 页。

⑧ 《陈云年谱》（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年，第 249—250 页。按：商品库存过多的形象说法是“肚子太大”，反之，压缩商品库存即为“泻肚子”。

负商品收购、调拨与流通任务。各级批发站之间都是买卖关系，通过签订供应合同，组织商品流通。一级站设在生产集中的城市和进口口岸，负责收购当地产品，接收进口物资，对二级站调拨供应；二级站设在主要生产城市和交通枢纽城市，负责收购当地产品，向一级站进货，对三级站组织供应；三级站经营批发和零售业务。核定资金是实行经济核算制的重要内容，它促使企业合理使用资金，加速商品流转和资金周转。^①但按照淡季标准核资，也造成当时核定的流动资金过紧。为了归还欠账，各级商业公司纷纷大力压缩库存，且为避免发生新的商品积压，组织货源、加工订货等业务停滞，进货量大为缩减。1953年第一季度，仅试点的百货公司系统就归还上级公司欠款6000万元；全国国营商业公司比1952年底减少了近2亿元价值的商品库存，大量商品出现脱销。武汉市国营零售商店脱销上海货327种，医药公司四成以上的热销货脱销。郑州、开封等地的百货公司脱销商品也达百余种。^②

各公司在清产核资中，发现许多实际问题。由于缺乏历史统计数据，他们无法掌握每件商品的流转周期；又由于账目不清、账货不符，定额流动资金与超定额流动资金长期混用；还有许多资金由于下级公司及银行未能及时结算而被占用，各方相互牵扯，以致均未能清算^③。各公司独立建账后，还出现了新的问题。过去国营商业机构不必考虑盈亏，财务收支计划和商品流转计划无人关心，各级批发站之间的供应价差价小^④。现在情况大不相同。每一层级的国营商业公司都要完成自己的财务计划，零售公司从上级专业公司批发商品不再享有价格优待，且必须现款交易；各级国营商业公司固定了流动资金、上缴利润、节约成本等费用后，差价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其利润上缴指标的完成。因此，各级批发站在核资后层层增加了定额费用，并依此扩大地区差价，偏远城市的供应价要比中心城市高出很多。湖北宋埠、广水、蒲圻等地与武汉地区的供应价差价一般在10%以上，洪湖等地甚至要高出16.4%。^⑤

这些地区的国营商业批发站提高供应价以后，中小私营批发商和零售商便不再从国营商业公司进货，改往货源地购货，以降低成本。如湖北广水商店要进上海货，从国营上海中央站（一级站）到武汉站（二级站）就要加价1.89%，而广水私商直接向上海厂商进货，另付运输等费用也不过增加1.05%的开支^⑥。武汉等大城市的私商则可以更多利用地区差价盈利，如武汉市国营花纱布公司白布牌价每匹39.1元，私商向上海厂商进货每匹36.3元，除去运费，每匹仍净赚2.1元；私营百货业每月向上海购货的金额，占进货总额的63%以上。济南市百货业私营批发商从上海进货，进销差价在10%以上，搪瓷面盆等部分商品的差价可达到30%以上，盈利颇丰。1953年初，来上海采购的客帮人数，为近三年之最。25家客栈统计显示，1953年1月至4月来沪采购人员较1951年同期增加了76.4%。^⑦

商业部推行经济核算制以来，国营商业大量压缩库存，减少进货；私商不愿向国营批发站进货，致使国营商业营业额大幅下降。1953年上半年，市场上出现了所谓的“公退私进”。上海市国营商业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由1952年占私营工业总产值的56%，下降为1953年上半年的48%；华东区国营商业公司第一、二季度末工业品的库存，均较1953年初减少40%以上。与此同时，私营厂商扩大了自产自销，与私营批发商加深了贸易联系，期票等商业信用形式盛行。私商经

① 《新中国商业史稿（1949—1982）》，第29—30页。

② 《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商业卷》，第644、650页。

③ 《上海市人民政府商业局关于上报贯彻经济核算制情况的专题报告》（1953年8月22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11-2-334。

④ 《上海市人民政府商业局关于1953年推行经济核算制的初步总结》（1953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23-2-11。

⑤ 《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商业卷》，第649—650页。

⑥ 《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商业卷》，第649—650页。

⑦ 《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资料）》，第101页。

营的针棉织品、化妆品、纸张等商品的市价，低于国营牌价5%，迅速扩大市场销量。^①在批发商业中，上海市私营批发比重从1953年第一季度的39.61%上升为第二季度的42.32%；天津市私营批发比重从1953年1月的26.36%上升为6月的34.92%^②。西南、中南各区也报告了相似的情形。1953年初，国营商业公司的营业额较上年末显著下降。重庆市国营商业公司营业额下降了近五成，成都市花纱布公司、工业器材公司、百货公司、医药公司分别下降了67.59%、66.03%、63.47%和54.56%。而私营批发业务上升很快，重庆市绸布业11户私营批发商1953年1月、2月营业总额比1952年11月、12月上升了59.6%。^③

三、新税制出台与国营商业牌价上涨

1952年9月以来国营商业企业的经济核算制未及落实，就被新出现的市场问题转移了注意力。从根本上说，国营商业企业能够通过抬高价格获得更高的利润，自然就削弱了其改善自身经营以增加盈利的积极性。就这一点而言，新税制的出台就有了推进国营商业企业落实经济核算制的意义。

1952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发布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说明新税制的主要内容如下：（1）试行商品流通税，将卷烟、烟叶、酒、面粉、火柴、棉纱等22种商品的货物税、批发营业税、零售营业税及附加、印花税等，合并为单一的商品流通税，在批发和收购环节一次征收；（2）货物税、营业税、所得税等也将一些项目合并简化。新税制还规定，工业的总分支机构从产制、批发到零售，一律要课三道营业税；商业的总分支机构从批发到零售，一律缴纳两道营业税；同时取消对合作社减征20%营业税的优待。^④对此，《人民日报》同版发表社论强调：“修正了的税制继续保持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原则”，“增加了国营商业及合作社的税收负担”，“使得国营商业、合作社与私商完全处在同等待遇之下”，“促使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努力改善经营，推行经济核算制，降低成本，加速资金周转，降低流转费用”。

新税制在原则上强调“公私一律平等纳税”，从具体执行办法看，核心在于保证每个流通环节的税征到位^⑤。根据财政部下发的营业税纳税补充规定，相对于国营商业机构和合作社从工厂进货经过批发到零售要纳三道营业税，工厂自售产品也要缴纳两道营业税（工业一道、商业一道）。换句话说，商业批发环节的营业税移至工厂一次缴纳。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工厂在本地或外埠卖货给零售商，或外埠零售商直接到工厂进货，都要缴纳一道批发营业税，以杜绝以往“厂零见面”少征一道营业税的可能性。试行商品流通税也有相同的目的，即集中在一个环节控制税源，既加速财政收入入库，且当某一商品利润过大时，也可通过调整税率，用税收形式提前收回一部分利润。考虑到新的税制对于私营批发商的冲击是最大的，他们从工厂进货要多纳一道营业税，如不扩大批零差价，将无利可图，财政部特许专营批发商不课营业税，而批零兼营的批发商仍要依照新税制办法执行。^⑥

众多的私商由于资金短缺，往往是批零兼营。1953年，上海全市私营商户约6万户，除5800余户专营批发外，其余均以零售为主或批零兼营，占总营业额的近七成^⑦。为解决纳税问题，批零兼营户被要求选择专营批发或专营零售，但在具体操作中，批零业务并没有明确的划分标准，只是以起批点作为划分依据：起批点设低即为批发，起批点设高了则为零售。因无法准确划分批零业

① 《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年—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09—410页；《上海市第一商业局1953年关于调整商业及税制后的上海市情况的报告》（1953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23-2-77。

② 《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资料）》，第104页。

③ 《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财政卷》，第536—539页。

④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人民日报》1952年12月31日。

⑤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164页。

⑥ 《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财政卷》，第364、427页。

⑦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1953年上海市私营批发户基本情况综合表及商业基本情况统计表》（1953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182-1-598。

务，大部分批零兼营的私商均按零售加征一道营业税，只有一小部分私商核准为专营批发商，不纳营业税（1953年8月以后，这部分私营批发商也统一照纳营业税）。除了批零业务无法准确划分引起纷争，还有一些专门为下游工厂生产原料、物料、零部件、包装容器乃至半成品的工厂，也无法简单按照新税制予以加税，存在争议。理论上说，这些工厂生产的主产品不进行市场交易，不应多纳一道商业营业税，但考虑到它们仍会有少量产品流入配件市场，如不加以区分，可能会成为管理上的漏洞，对这些工厂也必须根据其具体情况分别核定税收标准。^①

新税制为保证三道营业税，限制代理经营的商业关系，还规定无论是国营还是私营工商业代购代销，不再依手续费收益课税，改按销货营业额课税。中间商在私营商业中占有不小的比重，特别是在副食品、手工业品等行业中。如牲畜业具有储运困难、流转环节多的特点，蔬果业以品种多、保鲜难为共性，拥有专业存储、加工、整理能力的中间商便在这些行业中普及起来。他们与产区农户关系密切，有时还要为后者垫付资金。经营手工业品的中间商则可能联系着成千上万的个体手工业劳动者。新税制大幅提升代理经销的税率，使中间商利润下降，也将影响过去依靠商业代理经销的产品的推销。如天津市百货公司过去代销74户手工业的日用产品，每月销售量达50万余元，税率提高后，百货公司不愿再增加资金代销；大兴隆纸行1952年自营营业额2.7万元，但代销营业额有76万元，代销税收增加后，已无法盈利；还有一些生产零部件的手工作坊与代销商，也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如今均难以维持经营。以上所涉行业如歇业，不但造成工人失业，而且将减少一大税源。因此，天津市财委认为，限制代理经销对于保证税收而言，是“得不偿失”。根据华北全区统计，1953年第一季度全区实收税款较上年第四季度增长0.35%，增长并不显著。^②

新税制带来的更大争议，是同期的物价上涨。1952年12月初，北京市即有4479种商品提高了零售价格，一个月后又又有1370种商品调整了价格。两次涨价后，面粉的售价上涨6.3%，大米上涨8.8%，小米上涨2.3%，玉米上涨3.7%。天津市的主要日用商品也普遍调高了零售价，25种粗粮售价上涨2.15%，细粮上涨6.2%。特别是卷烟、酒等商品改征流通税后，涨价较多。依据华东贸易部的指示，上海市率先将卷烟售价调高了20%，后又改为按原价上调8%出售。频繁调价很快引起上海乃至其他城市的私商到商业公司挤购，以致一些未调整价格的商品的销售量也大大增长。面粉零售价在新税制颁布前已经有过多次调整，华北区国营商业公司先于1952年10月上调季节差价4.8%，12月又因扩大批零差价上调零售价1.8%，再加上1953年初的上调，合计涨价超过10%。^③从各类商品的物价指数来看，1953年初价格上涨较多的农副食品，并非受新税制影响。由于粮食供应紧张，市价高于牌价，国营粮食公司为与私商竞争、完成收购任务，提高了收购价格。粮价上涨后也带动了土特产和副食品价格的上涨，再加上外销扩大，黄花菜、粉丝、花椒、木耳等价格上涨了30%至50%；川芎、白芍、园参、黄连、黑瓜子等小土产价格上涨了一倍以上。^④

四、新税制的争议与调整

1953年1月初，新税制颁行伊始引起的物价波动及争议便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二书记、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向明等三人联名给中共中央写信，反映新税制执行后引起物价上涨、私商抢购等情形。其后，北京等地也报告了类似情况。为此，毛泽东请薄一波等人汇报新税制与旧税制的利害比较，以及新税制引起物价波动的原因。中财委提交的报告强调，实行新税制既是“为了保税”“为了简化”，也是为了试办商品流通税——“这是最彻底的简化”，“便于对国

① 《1953—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财政卷》，第445—446、463页；《上海市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最近贯彻修正税制情况的报告》（1953年5月23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B28-1-29。

② 《1953—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财政卷》，第387、437—439、499页。

③ 《1953—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财政卷》，第432—435页。

④ 《1953—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商业卷》，第826—827、836—838页。

营企业实施财政监督和推行经济核算”，“为将来全面实行周转税创造条件”。周转税是苏联在 20 世纪 30 年代税制改革时确立的在商品流转过程中一次课征的税收。国营企业通过缴纳周转税和利润提成完成预算缴纳，其中周转税归并了营业税、消费税、所得税等多税种，是苏联国家预算的最主要收入。周转税主要面向轻工业和食品工业部门征收，盈利较低的重工业部门一般不纳周转税。^①因此，周转税起着拉平各部门利润率的作用。对于国营企业部分利润过大的商品，财务部门通过向其征收周转税，挤出利润，收归国库。中财委解释，新税制虽然有一些加税的因素，但税率有升有降，总的来说，对物价和消费者负担影响不大。现在因新税制颁行引起的物价波动，只是暂时的。中财委认为，新税制主要影响的是产地的私营零售商，过去他们一般不经过批发商进货，以减少课税，现在普遍要多纳一道税。^②

中财委此时还未意识到，新税制冲击更大的是国营商业，而非私营零售商。新税制颁行后，大部分私营零售商仍保持原有的进货渠道。根据 1953 年 5 月的调查，北京市几个主要行业的私营零售商从工厂进货的金额比重始终保持在 43% 左右，其中 80% 以上是从上海等地进货；从国营公司进货部分一向只占 37% 左右。同样，天津市这些行业的私营零售商从工厂进货的金额始终保持在 46% 左右的比重，其中约半数从外埠工厂进货；从国营公司进货部分只有 20% 左右。与此同时，内地私商更倾向于直接从外埠工厂进货，他们从上海等地工厂的进货价格要低于当地国营商业批发价，凭借银行对埠际贸易提供的押汇业务，便可以低于国营商业的零售价，扩大销量。^③

中财委对新税制的说明也不能令毛泽东满意。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新税制关于“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原则，违反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将税收政策作为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方面的决议。修改税制一事在“事先没有报告中央”的情况下，“找资本家商量了”。^④1953 年 6 月至 8 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会议。周恩来在总结会议时，重申了“税收政策，对公私企业应区别对待，繁简不同”。新税制主要负责人薄一波在会上做了检讨，承认自己年初公布新税制时在社论中提出的“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宣传口径，是带有原则性错误的。国营经济要上缴利润，其享受税收优待是应该的，不能与私营经济同等对待。错误最大的是对私营批发商不征税，批发税提前至工厂缴纳，致使国营商业、手工业及内地中小城市工业都受到冲击，而专营批发商“横行霸道”。为此，今后将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重新调整税制，工厂批发税退至批发环节缴纳，合作社仍享受税收优待。^⑤财政部发出通告，自 8 月 1 日起，凡经税务局批准不纳营业税的私营批发商一律照纳营业税^⑥。此次财经会议还重新确定了实行经济核算制的企业的核资办法，将按淡季标准核资改为按全年平均标准核资，并允许一些条件不具备的商业企业，仍暂实行贸易金库制度^⑦。

1953 年下半年，全国私营商业开始萎缩。在上海、广州、北京、重庆、西安、长春、哈尔滨等七个城市的批发销售总额中，私商经营的比重从第二季度的 40.95% 下降为第三季度的 37.39%。相反，国营批发商业迅速扩张。到第四季度，国营商业批发销售额直线上升，各城市市场批发额中国营的比重，上海为 67.38%，天津为 71.34%，北京为 78.08%，沈阳为 81.83%。1953 年 7 月以后，来上海采购的客帮日渐减少。据统计，第三季度客帮采购棉布数量 154 万匹，比第二季度减少 33%。上海本市的部分零售商也转向国营公司进货，私营批发行业如棉布业 1953 年 8 月营业额比 7 月减少五成左右，橡胶、热水瓶等行业减少二成多。因货源缺乏或进销差价过小，上海的木材、杂货、棉布、毛绒线、铜锡、汽车材料等 16 个私营批发行业均难以维持；天津市 1953 年第四季度

① 许毅、沈经农主编：《经济大辞典：财政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 年，第 283 页。

② 《1953—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财政卷》，第 463—468 页。

③ 《1953—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财政卷》，第 505、537—538 页。

④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第 166 页。

⑤ 《1953—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财政卷》，第 483—484、1165 页。

⑥ 陈如龙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大事记（1949—1985）》，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 年，第 83—84 页。

⑦ 《新中国商业史稿（1949—1982）》，第 30 页。

私商营业额与7月比较,新药业下降幅度在50%至60%之间,纱布、五金等业下降幅度在40%至50%之间,百货、纸烟、杂货等业下降幅度在30%至40%之间。^①

随着粮、油、棉等行业相继实行统购统销,国营商业控制了绝大多数的工农业产品货源,私营批发商营业额更是急剧下降。1954年,全国私营商业批发额比上年下降63.5%;1955年又比1954年下降51.4%。全国私营商业批发额在公私批发总额中所占比重从1953年的30.3%降至1955年的4.4%。^②这意味着批发商业自由市场已近消失,主要行业的私营零售商不能再从私营批发商或从厂商那里进货,而必须从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方面进货。私营零售商因资金和信用不足,过去一般依靠占用私营批发商的资金实现周转,私营批发商削弱以后,私营零售商的萎缩也在所难免。1954年以后,私营零售商经销、代销国营商业委托商品的经营方式开始发展起来,具有更大灵活性的批购零销减少^③。到1955年,经销、代销成为私营零售商经营的主要形式,其营业额占到公私零售总额近14.6%^④。考虑到商品流转渠道已彻底改变,1955年10月12日,财政部发出《关于对私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有关交纳工商业税问题的通知》,规定私营商业(包括小商小贩)接受国营商业、合作社委托代购、代销、代批,不分工农业产品,均就所得手续费按7%税率缴纳营业税^⑤。

五、结 语

1949年后,中共对于工商关系以及商业与财政关系的认识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国营商业企业推行经济核算制要晚于工业企业,其原因就在于当时认为国营商业部门主导市场价格且有计划地安排全国商品流转的重要性,要甚于其自身创造的利润价值。但是,随着国营商业不断扩张,对其经营能力的忽视,导致商品流转和资金周转缓慢,最终也将影响投放工业生产领域的资金回笼和工业的扩大再生产。1953年前后,大规模经济建设规划的启动,意味着更大规模财政投入的开始。1953年,中央各工业部的基本建设投资比上一年增加了116.6%,173个重大项目上马。为此,国家财政需要更多的收入来源。在收入构成中,各项税收收入(以工商税收为主)占到近五成,国营企业和地方国营企业的上缴利润和折旧费占到近三成,工商税收在此阶段仍是最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⑥

1952年“五反”运动后,私商的衰落使得中央政府能够获得的工商税收减少;同期不断取代私营商业的国营商业却没有能获得相应的利润增长,大量商品积压,长期占用资金。1952年底国营商业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与1953年初税制改革的启动,都是中央政府从商业流通领域增加财政收入的尝试。前者可减少商品流通成本,加速资金回笼,后者为确保每个流通环节的税征到位。新税制出台后,在市场供应中出现的“公退私进”,不是取消国营商业税收优待的结果,而是同期国营商业企业推行经济核算制的连锁反应:一方面,核定资金后,国营商业企业纷纷压缩库存、归还欠账,同时减少了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私营批发商从而获得了更多的货源;另一方面,为完成财务计划,各级国营批发站层层提高了供应价,致使原先从本地国营商业进货的中小私营批发商也改往货源地进货,国营商业批发营业额下降。

(本文作者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 吴志军)

① 《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资料)》,第122—123页。

② 《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资料)》,第26—27页。

③ 经销,指国营商业将商品委托私营零售商销售,后者以现款按计划从国营商业进货,并按照零售牌价出售商品,赚取批零差价。代销,指国营商业将商品委托私营零售商代理销售,后者按国营商业规定的牌价出售商品后,货款全部缴回国营商业,赚取一定的手续费。批购零销,指私营零售商以现款从国营商业进货,按照国营牌价或核定价格零售。批购对私营零售商的约束主要体现在价格上,其他约束不大。

④ 《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资料)》,第27页。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史料·第四辑·工商税收(1949—1982)》,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第374—377页。

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史料·第二辑·国家预算决算(1950—1981)》,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年,第33、45页。